

第二章 鷄首壺的源起

本章將分三節，從雞首壺的定義與形成的相關歷史背景，討論雞首壺的器型推測是延續著西晉盤口壺的發展，和魂瓶的鳥獸類裝飾造型基礎，繼續傳承下去。其次將討論，雞首壺的形成因素；第三節，討論雞首壺中「雞首」的象徵意義。

第一節 雞首壺的定義與形成的相關歷史背景

任何器物的形成與人的使用有息息相關，手工業製陶的發展也受到影響，從歷史的角度探討，雞首壺的定義與形成，更能夠彰顯雞首壺在時間的洪流中，與生活的相關意義，以下分兩小部分，從定義與形成相關歷史背景，作為說明探討。

一、雞首壺的定義

回顧前人的研究中，謝明良認為從六朝到隋唐，在壺或罐的肩部裝飾雞頭形象的作品，稱作「雞頭壺」，因無固定的稱呼，又被稱作鷹首壺、雞頭罐、天雞壺、「雞首壺」、雞壺等。¹張業林、王苗苗認為雞首壺是出現於三國末年，流行於兩晉至隋，因肩部塑雞首形而得名。²孫秀蓮認為雞首壺習稱雞頭壺，因器身置雞頭，故名之。³而隨著時代的推移，到了南朝時

¹ 謝明良（2006），六朝陶瓷論集，頁 325。

² 張業林、王苗苗（2006），談雞首壺的造型功能演變，頁 21。

³ 孫秀蓮（1997），淺談雞首壺的演變與越窯雞首壺，遼海文物學刊，第 1 期，頁 75。

期，出現的雞首壺以壺嘴作成雞首狀而得名的描述，⁴朱伯謙在文章中稱雞首壺，又依照各個朝代而有不同的裝飾手法，若以西晉為例，則有雞頭與雞尾在壺的肩部對稱地裝貼，若在罐或盤兩面裝雙繫或四繫，也稱作雞首壺或雞首罐。⁵在筆者的論文中，藉由以肩部以雞為首形的壺，作為以「雞首壺」的命名為主。

筆者統計命名，就目前收集到資料為主要參考內容。(表 2-1)⁶

表 2-1：雞首壺命名表

名稱	出現次數
1.雞首壺	79
2.雞頭壺	11
3.雞首罐	2
4.天雞壺	8
5.鷹形瓷盤口壺	1
6.雞首瓶	1
7.壺	1
8.雞首瓷壺	3
9.雞首執壺	2
10.雞首陶壺	2
11.鳥首壺	1
12.瓷壺	1
13.雞頭瓷壺	2
14.龍柄盤口瓷壺	1

⁴ 按：此為青瓷雞首壺，為 1968 年在鎮江市三官塘磚瓦廠出土。故雞首壺前後期的使用方式是否也不盡相同，從陪葬品、明器轉變為實用品的形式，仍有待筆者釐清。此為鎮江博物館編著（1997），《鎮江文物精華》，江蘇：黃山書社，頁 113。

⁵ 朱伯謙（1999），《三國兩晉南北朝燦爛的陶瓷器》，中國陶瓷全集：三國、兩晉、南北朝，第四卷，頁 13。

⁶ 表 2-1 為筆者整理考古報告後，所製的表。

15.龍柄雞首瓷壺	1
16.龍鳳壺	1
17.龍柄四耳壺	1
18.龍柄雞首壺	2
19.雙腹耳龍頭柄雞頭壺	1
20.雙耳雞頭壺	2
21.天雞陶壺	1
22.雞冠壺	1
23.雙柄雞首壺	1
24.覆蓮雞首壺	1
25.蓮瓣雞頭壺	2
26.雞頭執壺	1
27.雞嘴壺	1
28.雞口水注	1
29.龍柄雞頭壺	1

就圖表顯示，仍以「雞首壺」為主要的稱呼方式，其次占大多數的為雞頭壺、天雞壺、雞首瓷壺等。其實雞頭即為雞首，無太大的差別性，只是本文以雞首壺作為稱呼的方式。

二、雞首壺形成的相關歷史背景

秦漢之後，中國歷史上進入一個特殊時期。從曹操建安元年（AD196）漢獻帝開始，到楊堅五八一年建立隋朝，如果算（AD589）滅陳，共 393 年這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

西元一八九年漢靈帝四月崩，子劉辯立為少帝，九月被董卓廢為弘農

王，旋被董卓弑，再立九歲的漢獻帝。朝廷政權的動盪爭奪，董卓為相國三年後被呂布所殺，爭權替換頻繁造成戰爭，姦亂、淫略、虐刑、濫罰殘酷至極。豪強戰爭造成「民相食，州里蕭條」「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淒涼景象。西晉統一，短暫的安定之後，出現賈后和八王之亂，惡戰又起，社會一片黑暗，出現民族大遷徙的局面。為逃避兵亂和饑荒，百姓走向邊遠地區求生存。邊遠的少數民族在其強悍武裝集團的帶動下進入經濟富庶地區。⁷從《南史·賊臣列傳》說：

「橫屍滿路，無人埋瘞，臭氣重數里，爛汁滿溝洫。
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絕，（侯）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
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⁸

百姓在侯景叛亂時，戰後怵目驚心的畫面，使得建康、三吳、會稽廣大地區，人跡罕至。百姓生活流離失所，生命無常水深火熱日子，殘酷的戰爭從大歷史的角度而帶了轉機，讓整個社會開始流動起來。在南北朝時期，長江中、下游和廣東、廣西、福建地區，由地廣人稀，火耕水耨變成「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的繁榮景象。⁹倉廩足衣食無缺之餘，對於日用器皿的工藝技術研究有所助益。

掌握先進生產技術的南遷僑民，和當地人民合力開發江南，故取得長江流域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手工業的發展，在經濟交往和文化藝術生活中占突出的地位，故南方的經濟、文化、中外交流等各方面都與瓷器有密切相關。¹⁰

民族融合是這段歷史最大的特點。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他們的流動伴隨著戰爭和破壞。他們要建立政權，也要和漢人聯合，

⁷ 李知宴（1996），中國陶瓷文化史，台北：文津出版社，頁 145。

⁸ 南史·賊臣列傳，卷八十，台北：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二十二冊，頁 833-835。

⁹ 李知宴（1996），中國陶瓷文化史，頁 145。

¹⁰ 李知宴（1996），中國陶瓷文化史，頁 147。

特別是勞動人民之間長期的生產，生活接觸，逐漸融為一體。為漢民族注入了新鮮的血液，與人們經濟、文化、生活聯繫密切的瓷器在此時期以承上啓下的新面貌出現。¹¹

在思想方面，衝破了兩漢以來的尊儒思想，知識階層都活躍起來，各種流派的學說在社會上都能產生一定的影響力，如：玄學、物理學等，甚至是外來的佛學，也都對當時的人民生活帶了影響，而陶瓷藝術在這方面的反映特別多樣。此外道家也很活躍，出現了大批的科學家，他們的成就對陶瓷的生產直接或間接有益，使得陶瓷美學的表達能力遠到一個新的水平。¹²

在陸路和海陸交通的開拓，外域的文化、工藝美術品如金銀器、紡織品也進入中國。例如南亞的佛教藝術在南北朝瓷器表現很多，成為陶瓷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而東南亞地區、波斯、阿拉伯世界乃至歐洲優秀的生活用具和文化藝術傳入中國，也對中國陶瓷藝術產生有益的影響，這一方面成為中國陶瓷文化史上一個特殊的時代特點。也為之後的隋唐陶瓷藝術的繁榮奠定基礎。¹³

「雞首壺」在這樣多元發展的歷史背景下，發展出其獨特的器型與功能，在之後的章節中將討論雞首壺形成的因素，來建構出其意義與價值性。

第二節 雞首壺器型的形成因素

雞首壺器型的形成因素，以下分三個小節作為說明。第一，分析中國本土因素，探討雞首壺由盤口壺演變而來的過程，及傳承堆塑罐上的崇鳥思想，進而證明崇雞思想的相關背景。第二，分析海上絲路影響雞首壺的

¹¹ 李知宴（1996），中國陶瓷文化史，頁 147。

¹² 李知宴（1996），中國陶瓷文化史，頁 148。

¹³ 李知宴（1996），中國陶瓷文化史，頁 148。

因素，試圖從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港口廣州，了解當時對外貿易的興盛與文化的交流。另一方面筆者探討中國與羅馬交流關係，從中佐證影響雞首壺的外來因素。第三，分析外來因素中的草原絲路，探討其影響雞首壺形成的因素。

一、中國本土因素

雞首壺是由盤口壺的器型演變而來。三國時的盤口和底部都較小，上腹特大，重心在上部，傾倒食物相當費力；佔據的平面也較大，而且還給人不穩定的感覺。東晉以後盤口特大，頸增高，腹部修長，各部位的比例協調，線條柔和，造型優美；重心向下，放置平穩，使用時比較省力。¹⁴

任何貯盛食物的瓶罐，都希望在平穩、實用、美觀、省力的觀點繼續改良，盤口壺也如此，故器體不斷加高，上腹略收小，下腹和底腹相應地擴大，重心向下更穩，而切合使用者的需求而有實際變化。從器物使用的演變圖中可以看出，器物在造型的發展，漸趨向合於實用。¹⁵

除了受到盤口壺影響器型的變化之外，雞首壺和堆塑罐在時代上也有承繼的關係。堆塑罐出土年代只限於三世紀中下葉和四世紀初，僅限於長江中下游，即三國吳孫權所管轄的地域。¹⁶

堆塑罐上面堆塑著上翔的飛鳥、人物的攀援上下，象徵著某種聯通性的存在，飛鳥、人物皆有上天入地的通靈能力，反映出吳越一帶的宇宙觀念。¹⁷且謝明良指出：「一般所飾繁縟裝飾的表現內容，無疑就是象徵人生富貴、多子多孫、五穀豐登、百獸率舞或喪葬禮儀的熱鬧場面。」他引用

¹⁴ 中國陶瓷史編輯委員會（1983），中國陶瓷史，台北：胡氏圖書，頁 144。

¹⁵ 中國陶瓷史編輯委員會（1983），中國陶瓷史，頁 144。

¹⁶ 郭麗英（1998），中國南北朝以前的佛教造像與江南地區佛教的傳入，遠望集（下），陝西：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頁 789。

¹⁷ 仝濤（2003），魂瓶所反映的宇宙觀念，南方文物，第 1 期，頁 30-33。

張極亢先生的話說：取子孫繁衍，六畜繁息之意，以妥死者之魂，而慰生者之望。對穀倉罐的功能可以說是很貼切。¹⁸

穀倉罐塑有複雜的內容，許多動物形象的器物肩部刻有雙翼，這與波斯薩珊王朝金銀器、西亞地區的石刻藝術都有相似點存在。¹⁹故雞首壺與堆塑觀應有延續的關係存在。

為何眾多的繁縟裝飾僅剩下「雞首」裝飾在雞首壺上，以筆者的推測，東晉推行「薄葬」，²⁰加上戰爭的頻繁，厚重的器物費時又費工，且不容易攜帶。雞為六畜之一，若由聲韻學的分析詮釋，從聲母言：雞字音「古兮切」，家字音為「古牙切」，二字同為「見母」字，現在同發「ㄐ」的聲母，為雙聲關係。從韻母而言：雞字在段玉裁第十六部，家字在段玉裁第五部。²¹董同龢的古韻分法，雞字在六佳部，家字在五魚部，相近二韻皆收-g-k韻尾。²²家與雞兩字聲母相同，而韻尾的不同，在諧音、諧義相近雙關聯想中，具有更多的象徵意義。以雞為家的祝福，對當時動盪的戰火，有一股家的安定可望，心中的期望在日用器物中，賦予雞有「創造安定」的概念，而作為陪葬墓主的器物，更多祝福的意味，象徵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甲骨卜辭諸雞字形皆象雞形，高高的雞冠修長的尾巴，一見可以別于其他的禽鳥，如（圖 2-1）字形 1。說文解字：「雞，知時畜也。从隹奚聲。」²³葉德輝在〈彝 奚為古雞字說〉文中提出為何六畜中，只有雞是形聲字，其餘馬、牛、羊、犬、豕五畜皆為象形字？葉德輝從三個字形上分析，首先彝字（圖 2-2），據「周禮六彝：雞彝、鳥彝、黃彝、虎彝、蜚彝、斝彝，以待裸將之禮。……古鼎彝字兩手奉雞，即造雞形之彝，以明敬獻之

¹⁸ 謝明良（1985），三國兩晉時期越窯青瓷所見的佛像裝飾，故宮學術季刊，第三卷，第一期，頁 47。

¹⁹ 李知宴（1996），中國陶瓷文化史，頁 152。

²⁰ 朱伯謙主編（1999），中國陶瓷全集：三國、兩晉、南北朝，頁 14。

²¹ 許慎、段玉裁注（2002），說文解字，台北：萬卷樓出版，頁 143、341。

²² 董同龢著（1974），漢語音韻學，台北：台灣書局，頁 246-260。按：再以竺家寧（2002）聲韻學，台北：五南圖書，頁 489、505。段玉裁十六部即支部，五部即魚部，在章炳麟的成均圖中，魚與支兩部是旁轉，而旁轉的特色：韻部之間有通押、假借、諧聲的現象。

²³ 許慎著；段玉裁注（2002），圈點說文解字，台北：萬卷樓，頁 143、669、648、503。

意，其餘五彝皆踵事增加。彝像雞形，猶爵像鳳形。」其次系字說文「繫也，从系丿聲。」葉德輝認為系字的籀文「从爪从絲」，「爪」象雞首，「8」象雞腹下肥特，「8」之重疊字「」兩距。再其次奚字（圖 2-4），說文「奚，大腹也。當云大腹禽也。禽鳥中大腹者惟雞。」葉德輝認為：這三個字，先造彝字，再造絲字（圖 2-3），最後成奚字。而且物象形有正、有側、有前、有後、有詳、有簡，皆以目所見畫而成形。因為雞為習見之物，就如同燕字與宴晏匱三字，雞與燕乃禽鳥中最與人習近者，故造字者各從所見而象形。²⁴說文從周禮宗伯司彝尊探源，雞是生活中熟悉，用形聲字即能達到約定俗成的溝通，也就是六畜僅雞字為形聲的原因。

季旭昇（2002）說文新證中，對雞字形研究，甲骨文的雞是象形，象雄雞形，特徵在雞冠和張大的欲鳴的喙，可能因為甲骨字小所以加「奚」，與其他的鳥區別不同。戰國楚系字都从「鳥」，秦文字以下才改為从「隹」。再從字形表，形 1 形 2 為象形，形 3 形 4 以加上「奚」，商代雞字已有象形與形聲二種並存，能為葉德輝的觀點：因為雞為習見之物，雞與燕乃禽鳥中最與人習近者，故造字者各從所見而象形，提供補充說明。

²⁴ 楊家駱主編（1997），說文解字詁林，台北：鼎文書局，第四冊，頁 245-246。

【字形表】

		
1 商·渙 259 (甲)	2 商·佚 740 (甲)	3 商·佚 547 (甲)
		
4 周·粹 1562 (甲)	5 周·寘魚用 (金)	6 戰國·齊·陶匱 3.306
		
7 戰國·楚·包 2.257 (楚)	8 戰國·楚·包 2.257 (楚)	9 戰國·楚·包 2.257 (楚)
		
10 秦·頤 6.45 (秦)	11 秦·睡 13.63 (秦)	

圖 2-1：雞的字形表²⁵

資料來源：季旭昇撰（2002），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上冊，頁 274-275。

²⁵ 季旭昇撰（2002），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上冊，頁 274-275。



圖 2-2：彝的字形甲骨文編

資料來源：陳新雄等纂（1987），字形匯典，台北：聯貫出版社，第 12 冊，頁 678-679。

				
1 滬乙 1598 (甲)	2 滬鐵 2.2 (甲)	3 滬前 7.4.1 (甲)	4 滬合 32384	5 滬小 亞系 (金)
				
6 滬壯系 (金)				

圖 2-3：系的字表

資料來源：季旭昇撰（2002），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下冊，頁 214。

				
1 滬甲 783 (甲)	2 滬鐵 49.3 (甲)	3 滬京 津 4535 (甲)	4 滬明 2097 (甲)	5 滬寧 1.186 (甲)
				
6 滬前 6.19.3 (甲)	7 滬粹 1341 (甲)	8 滬甲 1134 (甲)	9 滬明 藏 529 (甲)	10 滬漢 帝 71 (甲)
				
11 滬奚 出 (金)	12 滬奚 出 (金)	13 滬丙 申 角 (金)	14 滬亞 中 奚 蓋 (金)	15 滬中 邁 孟 (金)
				
16 春戰 侯 馬 92.45	17 戰 晉 廿三年 丘 戈	18 戰 楚 天 策 (楚)	19 西漢 老子 甲 後 404 (篆)	20 西漢 氏 古 地圖 (篆)
				
21 西漢 居 延 簡 甲 715 (篆)	22 東漢 曹 全 碑 (篆)			

圖 2-4：奚的字表

資料來源：季旭昇撰（2002），說文新證，台北：藝文印書館，下冊，頁 129-130。

從字音和字形的探討中，因「雞」與人類太熟悉，與生活息息相關。養雞可以追溯新石器時代已經開始，河北武安磁山、陝西西安半坡、湖北京山屈家嶺、山東泰安大汶口等原始社會遺址中，都有雞骨和陶雞的發

現，所以雞與家人相近。從而有鬥雞娛樂而有不同雞種育成，老子的雞犬相聞，春秋戰國時普遍養雞，且養雞術在齊民要術可得。²⁶家與雞是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故筆者推測「雞首」僅存在陶瓷器的主要原因。

二、外來因素－海上絲綢之路的影響

雞首壺除了受到傳統本土製作與使用方式，對於外來的影響相對也會衝擊傳統本土的製作，推測從海上商品的文化和陸上草原的絲路為主要衝擊來源，以下再分二個部分，以「廣東」和「中國與羅馬的關係」，兩大方面作為探討的內容。

（一） 廣東方面

蓋自紀元三世紀以前，廣州即已成為海上貿易之要衝。²⁷也由於對外交往的各種優勢，廣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市。²⁸（圖 2-5）

²⁶ 見：養禽辭典委員會編（1988），養禽辭典，江蘇：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頁 1-2。

²⁷ 鄧端本（1986），廣州港史古代部份，北京：海洋出版社，頁 25。

²⁸ 陳堅紅（1993），廣州古代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絲綢、陶瓷和茶葉，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頁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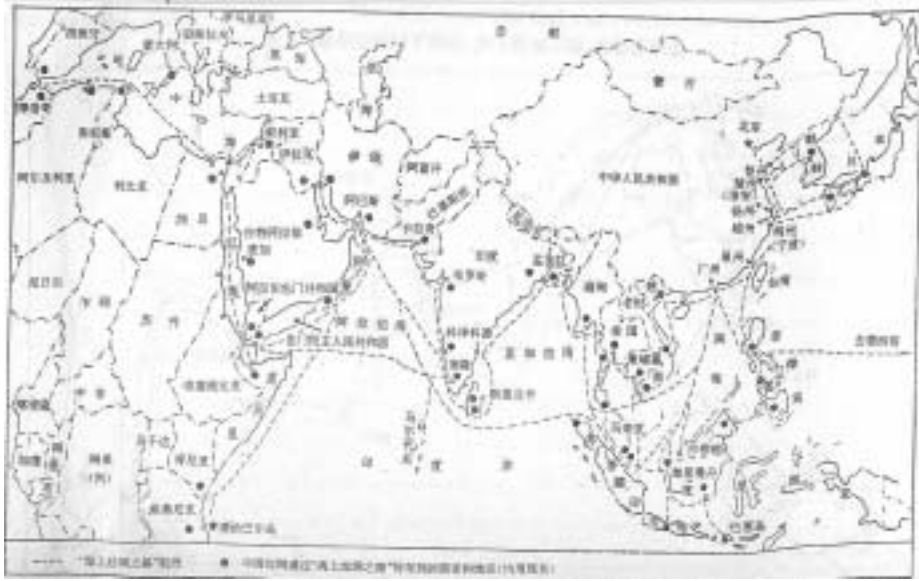


圖 2-5：「海上絲綢之路」示意圖

資料來源：劉迎勝（1995），絲綢文化海上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頁 9。

廣州古稱番禺，番禺一詞最早見於《淮南子·人間訓》篇卷十八。在漢朝廣州是南越國的都城，位於珠江三角洲北緣，西北東三江交匯處，地理條件優越，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對外通商城市，早在西漢時期就成為著名的都會之一，也是嶺南地區一個重要的河港兼海港，以目前的考古資料顯示廣州秦漢之際已有造船遺址發掘，廣州漢墓中經常發現的木船、陶船模型，以及有關海外交通文物的出土，提供早期海交史有利的研究。²⁹

在地理位置上，廣州位於珠江三角洲北部邊緣的終點，市區跨越珠江兩岸。市區南岸以河南構成廣州的南郊，市區的北岸東北部為白雲山地，白雲山脈向西南延長越秀山；西北部是低矮的丘陵岡地，西部和東部連成寬廣的平原，平原是由流溪河的泥沙沖積而成。這裡的地勢大致是東北高而西南

²⁹ 黃展嶽（1989），廣州漢代考古與海交史研究，海交史研究，第 2 期，頁 67。

低，形成向東南和西南傾斜的狀態。³⁰

據文獻記載，古代珠江流經廣州市區的前航道，河面比現在寬闊得多。東漢建安中，孫吳交州刺史布鷺（今廣州），當時他見到的情況是：「負山帶海……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可勝記。」《水經注》卷三十七，泝水條。³¹《三國志·吳志·陸凱傳》：「州治臨海，海流秋咸。」現今惠福西路五先觀所在的坡土，在晉代是個渡口。³²

依據《釋名·釋船》的記載「帆，泛也。隨風張幔曰帆，使舟疾汎汎然。」³³可知漢代的木船已普遍使用風帆。從考古出土文物，廣州漢墓發現木船和陶船的模型，當時廣州已擁有相當規模的造船，在造船能力和先進的技術水準，可以製造遠海航船。³⁴《淮南子》成書早於《史記》約三十年，³⁵〈人間訓〉篇在提到「番禺」這個名字時，是與秦始皇進軍嶺南連繫在一起的，所謂的「一軍處番禺之都」並且想獲得「犀角、象齒、翡翠」。這些貨物都是從南海諸國輸入的舶來品，可知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在廣南地區已經出現海外貿易。³⁶《淮南子·人間訓》記述當時秦向嶺南進軍的情況較詳細：

「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千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四軍都集結在五嶺之北，有一軍處番禺之都。」³⁷

³⁰ 廣州市文物管理處、中山大學考古專業七十五屆工農兵學員（1977），廣州秦漢造船工廠遺址試掘，文物，第4期，頁1。

³¹ 廣州市文物管理處、中山大學考古專業七十五屆工農兵學員（1977），廣州秦漢造船工廠遺址試掘，文物，第4期，頁1。

³² 廣州市文物管理處、中山大學考古專業七十五屆工農兵學員（1977），頁2。

³³ 劉熙（1986），釋名，卷七，欽定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21冊頁419。

³⁴ 黃展嶽（1989），廣州漢代考古與海交史研究，海交史研究，第2期，頁67。

³⁵ 按：姜亮夫（1993），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台北：台灣商務，頁6。劉安（？—西元前122年）撰淮南子，司馬遷（145BC—86BC）撰史記，故相差大約有30年之久。

³⁶ 陳炎（1985），東海絲綢之路初探—唐代以前的東海航路和絲綢外傳及其影響，海交史研究，第4期，頁6。

³⁷ 世界書局編輯部（1974），新編諸子集成，台北：世界書局，頁322。

指明五軍當中，有一軍是最先突破，早就到番禺地區的。番禺在嶺南所處的地理位置，扼距著東西三江要衝，加上「越人善於造船」，而嶺南又盛產木材，到達番禺的秦軍有這樣的地利、資源和技術條件，在此修建造船基地，為這場持續多年的統一戰爭，遷制運輸急需的船只那是很自然的事情。³⁸再以《越絕書·記地傳》說到越人：

「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

當時的廣州便是越人的一個出海口。³⁹以舟楫行船如陸地上的交通車馬，非常的方便。廣州自秦代便是海上交通之樞紐，從考古出土的報告發現，在廣州發掘秦代造船遺址，一個規模巨大的船舶工廠。這個秦漢時造船的工廠遺址，位於廣州市區，於1976年被發掘。在船場中心部位，發現有三個平行排列的造船台，還有木料加工場地。⁴⁰充分顯示造船技術的優勢，無疑為廣州奠定對外交往的物質技術基礎，歷兩千餘年而不衰。

自漢經三國、南北朝至唐，廣州幾乎壟斷中國海上交通和貿易。⁴¹這三個平行並列的造船廠，船臺滑道長8.8米以上，根據對船臺結構的研究，認為這裡主要生產平底船，吃水較淺，適合內河和沿海航行。由船臺滑道的寬距估算，在此可以建造寬6.8米、長20至30米，載重數十噸的大型木船，隨後又在這個工廠的西面和東南面，各距幾百米的地方，發現兩座造船遺址，其中一處已確知是東漢時期的。依此推測在西元前二世紀，遺址上的造船基地，廣州已建立起能夠生產成批的內河和沿海船隻。⁴²秦漢時期造船的歷史已發展到一個高峰，這個遺址是重要的例證。⁴³環海地區的交通頻繁，需要的船隻多則工廠需要有建造的規模。

³⁸ 廣州市文物管理處、中山大學考古專業七十五屆工農兵學員（1977），頁14。

³⁹ 鄧端本（1986），廣州是我國最早的對外貿易港，海交史研究，第1期，頁54。

⁴⁰ 廣州市文物管理處、中山大學考古專業七十五屆工農兵學員（1977），頁1。

⁴¹ 徐蘋芳（1995），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台北，允晨文化，頁400。

⁴² 黃展嶽（1989），廣州漢代考古與海交史研究，頁67。

⁴³ 廣州市文物管理處、中山大學考古專業七十五屆工農兵學員（1977），頁15。

在此發現的文物方面，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銀盒、金花泡飾、象牙和香料，⁴⁴乳香主要生產於紅海沿岸，南越王從南亞進口乳香是完全有可能的。⁴⁵廣州橫枝岡 2061 號墓出土的羅馬玻璃碗，此墓時代在西漢中期，相當於公元一世紀，這是目前所知中國發現最早的，且是年代最早的羅馬玻璃器。⁴⁶廣東英德南齊墓出土波斯銀幣，此墓有南齊永元元年（499AD）紀年磚。⁴⁷廣東曲江南華寺南朝墓出土的波斯銀幣。⁴⁸長沙漢晉墓出土的多面金珠。⁴⁹長沙黃泥塘三號東晉墓出土的多面金珠。⁵⁰湖北鄂城西晉墓出土薩珊玻璃碗⁵¹，應該是從廣州進口，沿當時的官路，越五嶺至鄂城。⁵²而關於南京，漢初屬丹陽郡秣稜，建安十七年（212AD）孫權改稱秣稜為建業，黃龍元年（229AD）孫權自武昌遷都建業，自此開始，南京作為六朝首都，逐漸成為江南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西晉建興元年（313AD）改建業為建康。建康通過沿海之港口（主要是廣州）與國外交往。近年來南京出土的外國遺物，多發現在六朝墓葬中。⁵³南京象山七號墓出土的羅馬玻璃杯和金鋼石金戒指。⁵⁴南京鼓樓崗東晉墓出土的羅馬玻璃杯，⁵⁵此墓屬東晉貴族墓（約公元四世紀上半葉）。⁵⁶南京石門坎六朝墓出土的玻璃器，⁵⁷江蘇鎮江句容六朝墓出土薩珊玻璃碗。⁵⁸南京的出土文物多，可以推知當時交通便捷，從番禺港登陸後，送往揚州等地。在伏波

⁴⁴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1991），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

⁴⁵ 徐蘋芳（1995），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台北，允晨文化，頁 401。

⁴⁶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博物館（1981），廣州漢墓，文物出版社。

⁴⁷ 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1961），廣東英德、連陽南齊和隋唐古墓的發掘，考古，第 3 期，頁 139。

⁴⁸ 廣東省博物館（1983），廣東曲江南華寺古墓發掘簡報，考古，第 7 期，頁 601。

⁴⁹ 湖南省博物館（1960），長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簡報，文物，第 3 期，頁 28。

⁵⁰ 湖南省博物館（1965），長沙南郊的兩晉南朝隋代墓，考古，第 5 期，頁 225。

⁵¹ 安家瑤（1990），試探中國近年出土的伊斯蘭早期玻璃器，考古，第 12 期，頁 1116。

⁵² 徐蘋芳（1995），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頁 404。

⁵³ 徐蘋芳（1995），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頁 405。

⁵⁴ 南京市博物館（1972），南京象山五號、六號、七號墓清理簡報，文物，第 11 期，頁 29。

⁵⁵ 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1973），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文物，第 4 期，頁 36。

⁵⁶ 徐蘋芳（1995），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頁 406。

⁵⁷ 李鑑昭、屠思華（1958），南京石門坎鄉六朝墓清理記，考古通訊，第 9 期，頁 66。

⁵⁸ 李家瑤（1986），北周李賢墓出土的玻璃碗—薩珊玻璃器的發現與研究，考古，第 2 期，頁 173。

將軍馬援（14BC-49AD）帶兵平定嶺外二徵之亂：

建武十七年（41AD）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六十外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⁵⁹

二徵之亂起因，交阯太守蘇定以法正其夫婿駱越詩索，建武十九年斬二徵傳首洛陽，馬援被封為新息侯，並勦滅徵側餘黨。所帶的兵力是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進擊到九真。交阯、九真在漢為交州，浪泊、交阯都在越南北部。馬援是緣海而推進，能夠緣海表示平時在交通上是通暢，二千艘船隻在海面上真是壯觀，載二萬兵力，二徵之亂勢如破竹。南方的薏苡實大，除筋骨邪氣，久服身輕益氣，軍隊凱旋還來，馬援載一車，當時以為是明珠犀角之類，薏苡明珠的成語從此產生。馬援的回程取陸路而回，交通的便捷由此可知之。

從《史記·貨殖列傳》中「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布之湊。」⁶⁰珍珠奇物以番禺為一都會，史記此段可以作為廣州港市形成的依據，在《史記·南越尉佗列傳》中漢武帝在元鼎五年和元鼎六年冬（111BC）對南越討伐，發樓船十萬師會番禺，⁶¹可以知道番禺是一個重要決勝的港口。這之前《竹書紀年》曾記載，魏襄王七年（312BC）「越王使公師隅來獻舟三百，箭五百萬，及犀牛角、象齒。」⁶²可知犀牛和象牙已經成為當時的貢獻品，雖無明確從番禺而來，從南方上來的貢品是非常重要的，而記載文獻中。

⁵⁹ 後漢書·馬援列傳，卷二十四，台北：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五冊，頁 373。

⁶⁰ 史記·貨殖列傳，卷一百二十九，台北：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二冊，頁 1192。

⁶¹ 史記·南越尉佗列傳，卷一百一十三，台北：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二冊，頁 1072。

⁶² 竹書紀年卷下，欽定四庫全書，303 冊，頁 40。

再以東晉法顯的《佛國記》有一段記載：

「(法顯)於是泛海西南行十四晝夜，到師子國。其國大洲上……多珍寶珠璣有牟尼珠。……法顯住此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復得一部雜藏，悉漢土所無，得此梵本已。即載商人大船，東行二日，便值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補塞船漏，於是復前，凡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上船，以四月十六日發。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遇黑風暴雨，客悉惶怖。諸婆羅門謂載沙門不利，議投法顯島，會有阻之者，獲免。時天氣連陰，海師誤向。經七十餘日，遂糧食水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可五十日便到廣州，今已過日，將無僻耶。」⁶³

法顯番海西南行，搭乘商人的船，商人乃以奇珍異寶為利，可知海上活動的頻繁，番禺是必經的港口。丁謙益在師子國的箋註說明：「西域記做僧伽羅，以昔有僧伽羅者能制服師子，顧以人名名之，又稱執師子國即今錫蘭島也。」⁶⁴可知法顯曾到達印度的恒河口加爾各答和錫蘭島。停留二年又再搭商人船到廣州。

法顯乘危履險投命於不全之地，忘身求法古今罕有。公元五世紀時，中國商船也曾活躍在波斯灣和幼發拉底河。到了七世紀以後，中國海船在印度洋和南洋一帶頗負盛名，阿拉伯的商人常搭乘中國的海船，往來於印度與東南亞之間。⁶⁵說明當時海外交通與貿易的狀況，早在晉代，廣州與南洋各國的商業已漸趨繁盛。⁶⁶

在海上絲綢之路中，海上交通不斷的開闢，形成港市的第一個條件。⁶⁷促使廣州對外開放，主要是在歷史上長期的對外開放，廣州港起了視窗的作用。廣州因港口而成為海上絲路的起點站，又因海上運輸路線的關係，需要讓船舶有停靠的地方，而形成通商的港口。在秦漢時期廣州的造船業

⁶³ 丁謙益纂(1915)，佛國記地理考證，叢書集成三編，新文豐出版景印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79冊 642頁、643頁。

⁶⁴ 丁謙益纂(1915)，79冊 643頁。

⁶⁵ 唐嘉弘、張建華(1997)，海上絲綢之路疏證，南方文物，第2期，頁66。

⁶⁶ 黎小明(1986)，廣州與古代僧人的海外往來，海交史研究，第1期，頁63。

⁶⁷ 言倩(2005)，負洲傍海商貿名港—廣州黃埔村考察，南方文物，第3期，頁101。

已相當發達，可以建造載重五十至六十噸的木船，與此同時廣州港也具相當的規模。且《漢書·地理志》也說：

「秦漢興，復立搖為粵王。是時秦南海尉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為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⁶⁸

經研究犀牛產自東南亞、印度和非洲，玳瑁珠璣是海洋的寶物，商人致富之道取於此寶，番禺是致富必經的地方。關於在廣州的漢墓，南越王的西耳室中，出土的象牙五支，成堆疊放，經鑑定為非洲象齒非亞洲象牙。直接提供南越與海外通商貿易有力的物證。⁶⁹因此，廣州港也完全具有海上絲綢之路起港的條件，在廣州或外地建造船址，載著絲織品及黃金等物品由廣州港，揚帆起錨，然後至日南障塞（今越南廣治附近）或徐聞、合浦。並從那裡出海，經北部灣，折向南，沿越南半島東岸，繞金甌角，過馬來半島，穿麻六甲海峽入印度洋，到達黃支國（今印度東南南岸康契普臘姆），換回明珠、璧琉璃等，正是這條以廣州為起港的海上絲綢之路，連接當時中國與東南各國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紐帶，同時也促使當時廣州對外開放的經濟繁榮。⁷⁰

廣州城區是隨著珠江岸線（即廣州港自然碼頭岸線）的推移而擴展。根據考古發展，秦漢時期，珠江北岸在今廣州市中山四路、登峰路及農講所一線，距現在的珠江北岸約一千二百米，當時廣州港碼頭岸線也大致與此吻合，從傍江秦漢廣造船遺址的發現，即可找到答案。此外，至今在這一帶地下鑽孔時，亦可找到蜆殼之類。晉代珠江岸，移至今惠福路五仙觀附近的坡山。當時這裡是廣州港的一個古渡口。南北朝廣州港碼頭的岸線，復移至今華林寺前的西來初地（為當時廣州港，對外開放的遠洋客運

⁶⁸ 班固（1981），《漢書·地理志》，台北：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三冊，頁 425。

又鄧端本（1986），廣州是我國最早的對外貿易港，《海交史研究》，第 1 期，頁 55。

⁶⁹ 黃展岳（1989），廣州漢代考古與海交史研究，頁 68。

⁷⁰ 程浩（1995），論廣州港在廣州歷史上的地位與作用，《海交史研究》，第 1 期，頁 38、39。

碼頭)。隋代，乃推至今西關泮塘、秀麗二路、三路及延安二路一線以南。

71

《漢書·西南夷傳》載，漢武帝元鼎五年秋（110BC），路博德為伏波將軍，楊僕為樓船將軍會師番禺，元鼎六年冬（111BC）滅南粵之後，⁷²派遣一支官方船隊，到達印度半島南部，最後到達錫蘭島（今斯里蘭卡）。與此同時，古羅馬帝國商人的船隊也由紅海進入印度洋，沿阿拉伯灣航行到印度半島南部，漢帝國和古羅馬帝國各自到達同一遠航點，中國與東南亞和歐洲發生貿易關係。⁷³漢武帝時大型船隊從廣東出發，通過浩瀚的南海遠達印度洋，和印度洋上的國家建立海上的聯繫。⁷⁴

又以譚躍的研究認為，建康文化的歷史存在，長安文化（秦、西漢）、洛陽文化（東漢、曹魏、西晉，本文為指含北魏時代）和建康文化（包括東吳時的建業）。在這三種都城文化類型中，前兩種都是基本於黃河流域本地土壤上，可謂根深蒂固，而建康文化卻不同，在東吳建都這裡之前，本地不過是秦漢以來長江南岸的小縣所在，人口不多，經濟水平一般，文化較為落後，吳大帝孫權成長於南方，他在都城建設中儘管採納不少中原傳統，但其主體文化型態仍是南方的，這種狀況一直保存到西晉，墓葬考古資料對比有直接的解釋作用，可是東晉、南朝卻不同，洛陽文化被整個移植到建康，對建康而言，從都城建設、國家體制、上層集團、人口構成，思想觀念、禮儀制度、語言風俗甚至生活習慣，都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又以建康為中心，向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地區播遷。⁷⁵

考古學上所見，從海上絲綢之路輸入的外國遺物，是以對外港口為起點，向內陸輸散，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江蘇、湖南、湖北、安徽、

⁷¹ 程浩（1995），論廣州港在廣州歷史上的地位與作用，頁 41、42。

⁷² 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1981），卷九十五，百衲本二十四史第四冊，台北：商務印書館，頁 1172。

⁷³ 閻曉青（2005），南海神廟—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遺迹，海交史研究，第 3 期，頁 95。

⁷⁴ 廣州市文物管理處、中山大學考古專業七十五屆工農兵學員（1977），頁 15。

⁷⁵ 譚躍（1998），南京六朝文物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東南文化，第 2 期，頁 71。

河南、山東等均有發現，自漢代以來，沿海的對外港口是廣州（番禺）、合浦、泉州、寧波（明州）、揚州，以及山東半島的嶗山（青州長廣郡牢山）和蓬萊（登州）。⁷⁶

番禺、徐聞（漢縣，在廣東海康，南齊時徙今地）、合浦、交州是早期港口，特別是廣州（番禺）成爲海上交通中心，它直接向六朝首建康供應外國珍貴物品，從廣州經英德、曲江，過韶關，越五嶺，至長沙（臨湘）、公安、江陵，然後順江至鄂城、南京（建康）。這是當時的官路，所以在英德、曲江、長沙、公安、鄂城、無爲各地有外國遺物發現，南京發現外國遺物數量、質量爲各地之冠，是符合歷史的脈絡發展的。⁷⁷故雞首壺的裝柄，從珠江流域擴散到長江流域，也是有其可能性的演變與發展。蕃坊是古代人外外國僑民居住區的稱呼，又叫蕃巷。它最早出現在廣州，是古代海外貿易鼎盛的一種表現。⁷⁸另外與中國有貿易交流的羅馬，也需要有如廣州對外與對內來往暢通的港口，來進行貿易活動與文化交流。目前的資料顯示羅馬有八角形的港口，可以連結對外與對內的貿易路線。（圖 2-6）

⁷⁶ 徐蘋芳（1995），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台北：允晨文化，頁 400。

⁷⁷ 徐蘋芳（1995），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頁 409。

⁷⁸ 鄧端本（1984），廣州蕃坊考，海交史研究，第 6 期，頁 74。



圖 2-6：羅馬港（Port of Trajan AD100-112）

資料來源：Thames & Hudson（2001），Rome splendours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181 High Holborn，London，p163.

（二） 中國與羅馬交流關係

魏晉之際，中國與羅馬的交往有所加強。以下就文獻上的記載《後漢書·西域傳》：

「大秦國一名犁鞞，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做黃金塗、火浣布。……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至桓帝延熹九年（西元 166 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⁷⁹

註解：

《晉書·四夷傳》：

「大秦國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椽栳，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罽，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武帝太康（西元 280

⁷⁹ 後漢書·西域傳，卷七十八，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七冊，台北：商務印書館，頁 1337-1338。

年-289年)中,其王遣使貢獻。」⁸⁰

又《梁書·諸夷傳》記有大秦商人：

「孫權黃武五年(西元226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歛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差吏會稽劉咸送論。」⁸¹

外形與中國人長得相似,只是在服裝上的不同,也就是稱大秦的原因,可知大秦與中國的交往中,相互感受到彼此異中有同,同中之異,而以秦帝國為名稱加上人長的高大,表示彼此之間的交往頻繁。從漢桓帝到晉武帝,大秦與中國的交往,文獻上都有記載。再以魚豢在《魏略》對羅馬的地理位置、風俗人情、政治制度、物產經濟尤其詳盡。⁸²彼此清晰對方的不同風俗、人種,故能留下文獻的詳盡史料。

除珍寶外,「刺金縷繡,織錦縷罽。」在史傳中出現。以唐代歐陽詢的《藝文類聚》卷八十五〈布帛類·錦〉

「梁皇太子,謝勅賚魏國所獻錦等,啟曰:山羊之毳,東燕之席尚傳,登高之文,北鄴之錦猶見。胡綾織大秦之草,戎布紡玄菟之花。」⁸³

在織布的紋路上,出現「大秦之草」作為謝啟,既是珍貴也是說明當時對大秦文物的交流。另外〈布帛類·布〉,歐陽詢引用晉殷巨的〈奇布賦〉序：

「太康二年(AD281)安南將軍廣州牧騰侯,作鎮南方,余時承乏,

⁸⁰ 晉書·四夷傳,卷六十七,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九冊,台北:商務印書館,頁693-694。

⁸¹ 梁書·諸夷傳,卷四十八,百衲本二十四史,第十四冊,台北:商務印書館,頁461。

⁸² 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卷三十,在陳壽評曰後,裴松之(AD 372-AD 451)引魚豢撰魏略西戎傳,台北: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第八冊,頁426-427。

⁸³ 于大成主編(1947),類書叢編第一輯,歐陽詢撰藝文類聚,第八十五卷,文光出版社,頁1458。

忝備下僚，俄有大秦國奉獻琛，來經于州（廣州），眾寶既麗，火布尤奇。乃作賦曰。」⁸⁴

從三次中國史籍記載的大秦人，身分可能都是商人，但羅馬史籍沒有當時遣使的記載，所以范曄在後漢書的西域傳中以「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⁸⁵，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後漢書時，引用魚豢的《魏略》：「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⁸⁶大秦國真的是個很奇妙的國家，從史料上值得注意的是，他們都是取道海路進入中國的。晉嵇含在《南方草木狀》記載其所奉獻為密香紙，嵇含在書中註明「交趾有密香樹」，⁸⁷而當時西方所用的紙為羊皮紙和埃及紙草，故認為這可能是大秦商人，在越南時得到當地的產品。

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中國與羅馬之間通過海路進行交往頻繁，我們可以推測，西晉時期出現的雞頭壺柄的上端直接黏貼接於器口這種裝柄方式，集中發現於中國南方地區，與這一歷史背景分不開來的關係。⁸⁸

另一種器物龍柄壺的生產都集中於北方地區，北區地區的龍柄壺，同時有受到波斯器物風格影響的痕跡。⁸⁹波斯壺、瓶類器物柄部，往往製作成直立的動物形象，動物直立的形象在西亞地區有悠久的歷史。其中在河北景縣東魏天平四年（AD537）高雅墓出土一件「獸柄四耳瓷瓶」⁹⁰，這件標本柄的形制頗具特色，龍身蹲踞於壺間，龍爪攀於盤口，龍頭俯銜口沿，雖具龍頭，但整個造型似猛獸人立，與波斯的器物造型頗相類似。⁹¹（圖

⁸⁴ 于大成主編（1974），類書薈編第一輯，歐陽詢撰藝文類聚，頁 1463。

⁸⁵ 後漢書·西域傳，卷七十八台北：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七冊，頁 1338。

⁸⁶ 見後漢書·西域傳，卷七十八，「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

下李賢引魚豢魏略為注解，台北：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七冊，頁 1339。

⁸⁷ 嵇含，南方草木狀，卷中，欽定四庫全書，589 冊，頁 8。

⁸⁸ 趙德雲(2007)，從雞頭壺到龍柄壺的發展—兼析外來因素在過程中的作用，考古與文物，第 1 期，頁 99。

⁸⁹ 趙德雲(2007)，從雞頭壺到龍柄壺的發展—兼析外來因素在過程中的作用，頁 99。

⁹⁰ 高 45 公分。盤口，長頸，肩有四繫，左右對稱，肩部飾有獸形柄。肩下飾有蓮花瓣紋，並貼塑花邊。釉色青帶褐黃，厚薄不勻，凝厚處呈墨綠色。見：吳戰壘（2003），圖說中國陶瓷史，台北：揚智文化，頁 67。

⁹¹ 趙德雲(2007)，從雞頭壺到龍柄壺的發展—兼析外來因素在過程中的作用，頁 99-100。

2-7)



圖 2-7：獸柄四耳瓷瓶

資料來源：吳戰壘（2003），圖說中國陶瓷史，
台北：揚智文化，頁 67。

這種風格與在羅馬帶柄器刺激下形成的、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龍柄雞頭壺頗相適應，在龍柄雞頭壺的生產中心轉至北方地區以後，進一步刺激生產，並使得龍的造型更加氣勢宏大，另外，隋唐時期出現的被稱為「龍柄鳳頭壺」⁹²（圖 2-8），壺蓋塑造成一個高冠、大眼、尖嘴的鳳頭，由口沿至底部連接著生動活潑的螭龍壺柄，兩只龍爪攀住壺肩，起到加固柄部

⁹² 時代唐，高 41.2 公分，壺口有鳳頭形蓋，與壺流吻合成鳳嘴。一側安龍形豎柄。通體施聯珠文、捲葉紋。造型優美、裝飾富麗，吸取波斯金銀器的造型和裝飾加以創造的器形。見：吳戰壘（2003），圖說中國陶瓷史，頁 89。

的作用，顯然與波斯直立獸柄器具有密切的溯源關係。⁹³波斯帶柄器的另一個重要特徵。⁹⁴（圖 2-9）柄部往往製作成兩兩相對的動物造型，其中一面有時又兼有流的功能。⁹⁵



圖 2-8：青釉龍柄鳳頭壺

資料來源：吳戰壘（2003），圖說中國陶瓷史，台北：揚智文化，頁 89。

⁹³ 中國硅酸鹽學會主編（1997），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221。

⁹⁴ 王敏（2006），古羅馬與波斯的玻璃器，玻璃器，上海：上海科技教育，頁 19-22。

⁹⁵ John Boardman（2000），Peria and the West, Thame & Hudson, London, p 187—188。



圖 2-9：伊斯蘭人製造的玻璃容器

資料來源：王敏（2006），玻璃器，上海：上海科技教育，頁 22。⁹⁶

若結合當時的國際形勢看，早期羅馬的勢力範圍強大。(圖 2-10)(圖 2-11)

⁹⁶ 4-5 世紀羅馬帝國開始崩潰，奢侈的玻璃製造技術逐步傳向東方。伊斯蘭人開始製造各種小瓶子和水壺等玻璃容器。若所溯其歷史，古希臘人的商業冒險和建立殖民地等原因，將現在的義大利和地中海地區成為遠古文明中發達地，在 30BC 羅馬人兼併了東地中海最後的獨立王國埃及，而公元 1 世紀左右，來自埃及、敘利亞的藝人將玻璃工藝傳到全盛時期的羅馬帝國。故羅馬帝國可以建立起重要的玻璃工廠，接受各地文化的交流。見：王敏（2006），玻璃器，上海：上海科技教育，頁 19、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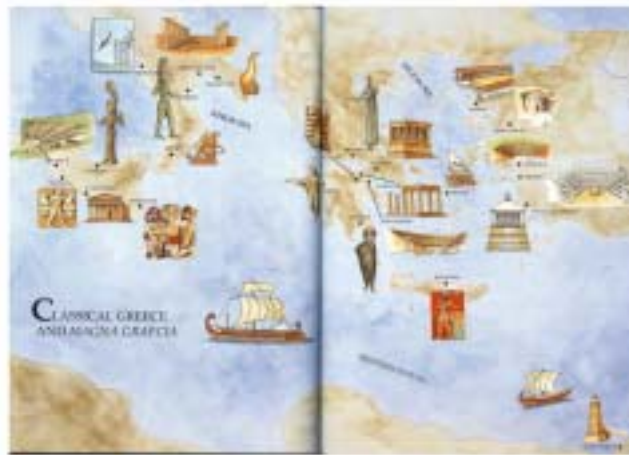


圖 2-10：希臘的地圖

資料來源：Thames & Hudson (2001), Greece splendours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181High Holborn, London, P54.55



圖 2-11：羅馬的地圖

資料來源：Thames & Hudson (2001), Rome splendours of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181High Holborn, London, P52.53

羅馬統治了地中海地區的土地與經濟，推測也相對地會繼承古希臘的傳統與製陶的技術。(圖 2-12)(圖 2-13)



圖 2-12：獸形水壺⁹⁷

資料來源：出版家編輯委員會編（1981），大英博物館，台北：出版家，頁 60。

⁹⁷ 張口動物是頭部為鷲、身體為獅，約為 675BC 的作品。見：出版家編輯委員會編（1981），大英博物館，台北：出版家，頁 60。



圖 2-13：羅馬帶柄器物

資料來源：趙德雲(2007)，從雞頭壺到龍柄壺的發展－兼析外來因素在過程中的作用，文物與考古，頁 100。⁹⁸

但中國與羅馬之間魏晉時期，繁盛的交往好景不長，三至四世紀時，整個歐洲大陸的政治經濟秩序發生深刻的變化，西方羅馬帝國處於內憂外患中，蠻族入侵，奴隸起義，鼠疫、地震等天災不斷，而貴族階級生活奢侈淫逸，導致大量貨幣外流，為維持龐大的軍隊和滿足消費，羅馬帝國在經濟領域推行高度壟斷經營，⁹⁹「只要他頭了船址或建立了商業關係，他立即就成為船主或商人的行業組織的一員，立刻就必須為國家服役，為國家進貨，而只取得少得可憐的報酬。或將他所需要出售之物優先供給國家。」

⁹⁸ 1.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薩珊銀壺。2.Apadana 雕刻中的雙鸚鵡柄壺。3.保加利業出土的雙柄銀壺。4.J.Paul Geity 博物館藏雙柄銀壺。

⁹⁹ 趙德雲(2007)，從雞頭壺到龍柄壺的發展－兼析外來因素在過程中的作用，頁 100。

¹⁰⁰這些情況嚴重影響羅馬對外貿易事業。

而在中國，西晉雖然短期實現統一，但隨後整個中國陷入分裂割據狀態，漢時的強盛和開拓的雄心不復存在，戰亂帶來的經濟衰退，和交通阻閉也限制海外交通的需求和能力。

與此同時，波斯境內的薩珊王朝取安息而代之，正處於欣欣向榮的上升勢頭。在海上把今阿富汗和北印度變成波斯帝國的總督管轄省，也大力發展海軍，控制從錫蘭到曼德海峽的通道，羅馬人要想獲得絲綢等中國商品，這時主要仰賴於薩珊的轉口貿易。¹⁰¹

綜合上述，從帶柄雞頭壺和龍柄壺，具有一脈相承的發展演變關係。龍柄壺最惹人注意的龍形象，是中國傳統的造型，同樣的雞頭也應該是傳統的信仰與寄託吉祥形象的產生，西晉以來雞頭壺的圓股形柄，發展至龍柄，受到羅馬蛇頭銜唇狀柄的啟發，從單柄發展至雙柄，又可能接受波斯對稱雙柄的影響。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於器物生產中心不同，其接受外來文化因素的側重是不一樣的，雞首壺剛開始的發展主要集中於南方地區珠江流域一帶，再慢慢地往長江流域擴散，主要是接受的是從南方海上絲路而來的羅馬文化影響。

在青瓷堆塑罐上的胡人，手上拿有中國傳統的本土樂器，如：鼓、簫、琴，也有另一部分為胡人所使用的樂器，如：琵琶、細腰鼓等，藉此可以發現三國至西晉時期，江南一帶的佛教傳播，以及佛教早在東漢末年已傳入中原地區，而吳屬地交州的最南端與林邑、扶南相連，藉由海上絲綢之路，此地由海路往南經馬六甲海峽可達印度，以至大秦。¹⁰²

在此推測下，雞頭壺受到波斯因素的影響也增強，¹⁰³透過北方的草原

¹⁰⁰ M.羅斯托夫采夫著、馬雍、歷以寧譯（1985），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商務印書館，頁 711。

¹⁰¹ 趙德雲（2007），從雞頭壺到龍柄壺的發展－兼析外來因素在過程中的作用，頁 101。

¹⁰² 周艷（2007），青瓷堆塑罐上的樂器、胡人和佛教音樂初探，東方博物，第 12 輯，頁 30。

¹⁰³ 阿里·瑪札海里（Aly Mazaheri）著、耿昇譯（2006），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頁 2-3。在此書中談及中國文化（也包括印度及中國周邊地區的文化）精絲綢之路傳到波斯，並得以在波斯發展然後又向西方（特別是羅馬）的問題，有

文化和南方海上絲路的影響，雞頭壺的器形演變因素也更加明確，雞頭壺本身的壺形可能有自原來的傳統盤口壺，而把柄為羅馬文化的因素，龍柄的出現可能和波斯文化有關，而關於雞的形象及出現可能也來是來自本土因素，和堆塑罐、魂瓶相對著有密切的關聯性存在，推測魂瓶當中鳥類物件的抽離與再創造，以上為筆者目前就其現有的資料所做的詮釋與研究，企盼有機會能有更多出土文物與歷史文獻資料，更加直接佐證其影響雞頭壺流行於六朝的因素。

三、 草原絲綢之路

位於歐亞大陸另一端的羅馬帝國，關於的發現為數眾多，就筆者所見，略舉數例。在羅馬帝國之前，生活於業平寧半島的伊特魯里業人（Etruscans）生產的帶柄玻璃壺，柄的上端直接黏接於器口，年代為公元前七世。進入羅馬帝國以後，這種形制的器物發現更多，如出土於義大利南部 Ventimiglia 地方一座古墓的一件帶柄玻璃壺，被認為是一世紀晚期義大利南部的產品；龐貝（Pompeii）古城郊外一座別墅中發現的銀制酒罐，明尼波利斯藝術學院（Minneapolis Intitut of Art）收藏的幾件羅馬玻璃器，時代為一至五世紀，柄的上端制成「蛇頭銜唇」式樣，與中國西晉至劉宋元嘉年間的一些出土物十分相似。¹⁰⁴漢代東西兩大帝國之間存在著直接或間接的交通，如：廣州西漢時期南越王趙昧墓出土的銀盒，¹⁰⁵雲南晉寧古滇國墓地出土的兩件鍍銀銅盒、¹⁰⁶暗示著這種交往主要是通過南方海路所

著深入的看法。並且他認為西方古代、中世紀，甚至是近代文明的許多內容都可以通過絲綢之路，而追溯到波斯，再從波斯追溯到中國。故波斯、甚至是羅馬因海上、路上絲綢之路的交流，相對於中國來說，應該是有受其影響。

¹⁰⁴ Minneapolis Intitut of Art , The Roman Glass, Minneapolis intitut of Art Web site.

¹⁰⁵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1991），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

¹⁰⁶ 雲南省博物館（1959），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

進行。¹⁰⁷雖然目前學術對此還有爭議。¹⁰⁸但至少漢代時中國南方地區已經接觸到由海路傳來的羅馬文化因素是沒有疑問的。¹⁰⁹

以動物之頭部或整個軀體為器物把手的造形，薩爾馬希亞人（Sarmatian）草原民族是古伊朗民族東邊的一支，在西元前三至二世紀間又向西來到黑海北部的草原地區，其勢力範圍介於裡海北部的伏爾加河到多瑙河之間，據出土資料顯示以動物軀體為器皿知把手，是凱爾特族藝術的特徵，這種造型可能為生存於高加索及頓河一帶的民族所創，當作把手的動物造形可能具有避邪的功能，¹¹⁰而象徵著這隻動物守護著器中物，這種詮釋可從東高加索一帶自古留傳至今的一句諺語得到輔證：「沒有把手的容器必須加蓋，有把手的容器，魔鬼是進不去的。」¹¹¹，故壺的把柄存在與否，成為器形上重要的物件之一。然而在中國西周晚期的人足獸鑿匜的把手，其造型就是一隻身子彎曲作攀援狀，頭往器內伸探的怪獸，這種飢渴欲飲之態表明此器皿為水器，同時也可詮釋為守護器中之物之意。¹¹²筆者查閱漢代的陶瓷器上也並無出現類似的把或柄的器型，故更加認為此為外來文化所影響。

就目前的考古資料顯示，雞首壺的壺型，來自於中國本土的盤口壺演變過來的，而關於把或裝柄可能是來自羅馬，早期為素柄或把，漸漸地演變為龍柄，可能受到草原絲綢之路的影響，又以波斯帝國為主。而關於雞首壺上「雞首」中，蘊藏著人類對於雞的信仰，以及崇鳥文化，衍生至崇雞文化的體現，筆者從中建構「雞首」的文化意涵。

¹⁰⁷ 林梅村（1998），中國與羅馬的海上交通，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文物出版社。

¹⁰⁸ 刑義田（1997），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關係的再檢討，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十二，上海：遠東出版社。

¹⁰⁹ 趙得雲（2007），從雞頭壺到龍柄壺的發展—兼談外來因素在這一過程中的作用，頁 99。

¹¹⁰ 張文玲（1998），古代中亞絲路藝術探微，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52。

¹¹¹ A.M Belenizki, (Lisa Schirmer 由俄文譯成德文) (1980), *Mittelasiens Kunst der Sogden*, Leipzig, p. 50.51。

¹¹² 張文玲（1998），古代中亞絲路藝術探微，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頁 53。

第三節 「鷄首」的象徵意義

中國人對梅蘭竹菊為四君子，左青龍、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為四獸，根植在文化的思維中，象徵既是吉祥的信仰，也是生活的意義。如三陽開泰、竹報平安、鴛鴦戲水、牡丹富貴、龍鳳呈祥思維文化中的信仰，象徵成爲一種重要的心理歸屬感。諧音與諧義的雙關，在生活中俯拾可得，象徵的意義發揮每個人的想像力，不送時鐘忌諱送終，不送雨傘怕離散，吃水梨怕分離，不勝枚舉。黃光男在《文化掠影》象徵對人類來說，具有各種不同的象徵意義，也由此分出不同層次上的心理感受。在現實生活中，鳥禽所具有的心理因素，是來自人與自然世界的交流。而鳥常常具有神話之寄寓，如鳳凰、金烏、仙鶴，有瑞祥之象徵。¹¹³目前雞分布全世界有一百五十五種，台灣有七種，大陸有五十九種，¹¹⁴可說是子孫眾多。

雄雞一鳴天下白的司晨功能，《周禮》「雞人」的職責，基本的「夜呼旦以弼百官」，以及「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雞人官職就像雞知時、報時。¹¹⁵易經「時之義大矣」，能夠在適當的時間，做適當的事情可以趨吉亦可驅邪，雞與吉聲音相近，而聯想起的意義。詩經鄭風〈女曰雞鳴〉「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因雞鳴而有琴瑟偕老多令人欣羨。又齊風〈雞鳴〉「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朱熹注：「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令君早起而視朝也。」賢妃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而雞如賢德之人，風雨如晦雞鳴不已，¹¹⁶是以雞除司晨報天職，生

¹¹³ 黃光男（2001），文化掠影，台北：史博館，頁 19。

¹¹⁴ 見韓學宏（2005），唐詩鳥類圖鑑，台北：貓頭鷹出版社，頁 76。按：體型似雞包括鶉、雉、鶇等，種間體型變化大，多數羽色艷麗，有些種類有冠或肉垂。

¹¹⁵ 周禮·卷二十（1966），「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鄭玄註「物爲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四部備要經部，台北：中華書局，頁 1-2。

¹¹⁶ 詩經讀本（1974），台北：大方出版社，頁 46、44。按：鄭風〈風雨〉「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朱熹注爲「淫奔之女言」，裴溥言認爲：淒風苦雨之夜，妻子空房獨守，而丈夫冒雨回家，該是多麼高興，振奮人心的雞鳴衝破黑暗迎向光明。見裴溥言

活中的聯想在詩經中已有不同的想像力，能琴瑟和諧又能賢妃之德，雞鳴喈喈內心喜悅，雞鳴膠膠疾病痊癒，然而在《韓詩外傳》中為雞有「五德說」：

「田饒謂（魯）哀公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拒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說。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¹¹⁷

因為接觸與聯想關係，所以田饒以雞有「文、武、勇、仁、信五德」，向魯哀公說明離開魯國，往燕國的原因。魯哀公雖說：「（田饒）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回答：「有臣不用，何書其言？」¹¹⁸如果政治上主事者能夠選賢與能，各司其職得人而任之，何事不可成？田饒以雞為譬喻，對國君的諫言存乎肺腑。

另一方面在中國古文化裡，雞與太陽有關，而有太陽鳥的聯想象徵意義。從盤古開天闢地，雞更為帝俊、帝堯的化身，盤古長著雞的頭，人的身，雞可以上推到盤古。¹¹⁹山海經中有豐富的聯想。太陽落地為神雞，雄雞畫成金雞，神荼、鬱壘是金雞下的二員大將。公雞能驅邪，所以古代民間流行貼雞畫。（圖 2-14）

（1994-1995）詩經：先民的歌唱，台北：時報文化，頁 277-280。

¹¹⁷ 見韓嬰撰韓詩外傳（1989），卷二，叢書集成續編，第 110 冊，頁 199。台北：新文豐出版。莊伯和（1992），幽幽潛五德—從歷代的繪畫中看中國人理想中的雞的形象，雞—生肖、藝術、命運，萬象圖書，頁 74。

¹¹⁸ 田饒還是離開魯國，到燕國為相。三年後，燕國政治太平，國無盜賊。國君任賢人之才則能安邦治國，不要以賢才距離近而忽視人才，魯哀公認為遠來的和尚會念經，所以千里黃鵠為貴，田饒只好另覓明主。借雞的相似點，作為說明國君對賢能者的尊重。雞已經因為接觸而有不同的聯想。

¹¹⁹ 陳勤建（2006），民俗文化趣談生肖，香港：萬里書店，頁 135-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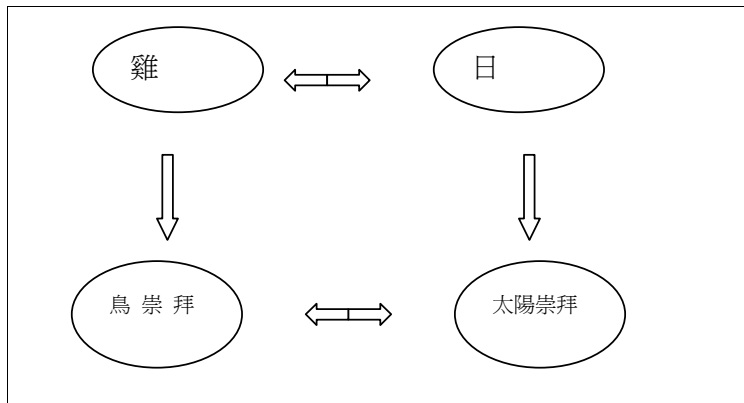


圖 2-14：雞、日、鳥崇拜、太陽崇拜四者關係圖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陳勤建（2006），民俗文化趣談生肖，香港：萬里書店，所製的圖。

鐘佩媛在《多維視角的觀察——中國崇鳥文化之研究》整理，從周禮雞人負責提供雞牲祭祀，探究雞的象徵意義。¹²⁰祭祀關係著五穀豐收六畜興旺為社稷根本，播種依時當然需要有專門的人掌管，雞人成為周禮必然存在的一官員。山海經的想像再附會遠古祖先帝俊帝堯，¹²¹雞已經成為生活化中的成員，門神的守護者。又以 1990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單位，清理離石縣馬茂莊村三座東漢墓葬，在兩座墓葬中發現雞首人身和牛首人身畫像石。雞首人身的靈物，處於飛升圖的下端，位於天上、人間的出入口，是天界守門人的角色。¹²²守住天界未來空間神聖，去凶、去咎才有機會升上天界。以漢應劭的《風俗通義》中載：

「俗說雞鳴將旦為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

¹²⁰ 鐘佩媛（2002），多維視角的觀察——中國崇鳥文化之研究，花蓮師院民間所碩士論文，頁 336-340。

¹²¹ 郭璞注郝懿行箋（1976），山海經箋疏·大荒東經，台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第十四卷，頁六。「有五采之鳥相鄉棄沙，為帝俊下友，帝下兩壇采鳥是司。」按：鐘佩媛論文引孫作雲中華文化單一起源論：大暉＝帝馨＝帝俊＝帝舜＝帝鷲（少昊）＝帝契＝伯益。同上註頁 32。

¹²² 陳勤建（2006），民俗文化趣談生肖，香港：萬里書店，頁 140。

故門戶用雞也。」¹²³

從知時到守門，實際功能到生活的聯想，雞已經進入心理的功能。在文中並且引用為魯侯「去咎」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有如代罪的羔羊，為主人除去身上的罪孽。

雞在民間受到歡迎，則多是因為雞與「吉」字同聲之故，大雞即大吉，也就是雞主「禦死避惡」陳勤建認為，雞為太陽鳥的世俗化身，而越地雞形盤古神話與太陽鳥信仰又有連結性存在，故以雞為原型的盤古及神話，可以說是在有民俗信仰的背景，讓原始的雞信仰與人類創世的探尋合流在一起。而雞鳴天亮，萬象更新的生物習性和自然觀象，雞與盤古的關係正是這個樣子，故盤古雞形形象，深植於先民的思想理念中。¹²⁴

現在民俗祭祀雞牲以為必要祭品，雞頭朝前與魚尾朝前截然不同，魚尾有餘，雞取吉祥之意。當宴客時，客人吃雞能祝福主人起家。劉善群著《客家禮俗》一書中，可知雞在結婚儀式中扮演重要的意義。兩姓結婚五世其昌，新婚夫婦合盃而飲，在儀式碗中去殼染紅雞蛋，新娘新郎各吃一口再交換吃，禮記昏義「共牢而食，合盃而飲」的大禮完成。贛南客家拜完堂，新娘新郎被送進洞房，喜娘拿熟雞腿在新郎新娘嘴上互晃，叫做晃雞臂，祝夫妻親密和好。寧化石城等的客家人，盃禮新娘新郎床前吃交盃酒，由二位德高望重者，一人持盤端上二碗雞腿，一位持酒，將熱水酒往雞上淋，然後由喜娘安排，新娘新郎交換飲酒吃雞腿。兩個雞腿必須同出一隻雞，新娘新郎各吃幾口，再交換吃，寓意百年好合。¹²⁵交杯的合盃的婚儀中佔重要位置，雞與家既有聲音上的關係，雞扮演著造端夫婦之始，相親相愛的齊家意義。雞形成生活的必需品，所象徵文化思維是多方面。

雞形成生活的必需品，象徵的文化思維是多方面。此外吳越先民世居

¹²³ 應劭，風俗通義，欽定四庫全書，卷八，862冊，頁400。

¹²⁴ 參見陳勤建（2003），中國鳥信仰－關於鳥化宇宙觀的思考，北京：學苑出版社，頁121-141。

¹²⁵ 劉善群著（1995），客家禮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頁71-72。

長江三角洲南翼地區，受自然生態與史前人文的世代累積影響，產生萬物有靈與動物、植物生人的觀念與習俗，以為動物、植物與人類有某種血緣關係，或是自己的祖先。¹²⁶而在四川地區的三星堆文化之中，所出土的青銅樹與金質的鳥形器，都顯示出商代時期的崇鳥與崇日文化的信仰。(圖 2-15)



圖 2-15：銅樹枝花蕾及銅鳥

資料來源：1999 年 3 月 27 日至 6 月 30 日三星堆傳

奇－華夏古文明的探索¹²⁷

¹²⁶ 呂洪年（2007），吳越先民圖騰崇拜述略，東方博物，第二十三輯，第 6 期，頁 65。

¹²⁷ 此為展出的展品製成的明信片。展出地點：國立故宮博物院，主辦單位：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國時報、太平洋文化基金會。

以弗雷澤（J. G. Frazer）在《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所說的交感巫術的交感原則，因為相似而建立聯想，因為接觸而傳達物的屬性。¹²⁸ 弗雷澤有一節提到「穀精變化為公雞」，這是西方的對雞的象徵意義，而在奧地利和德國有相似的儀式，在收穫時，殺公雞以象徵穀精的形象，來慶祝穀物的豐收。¹²⁹ 穀精是主宰糧食的關鍵，種植得時倉廩實可免飢寒。

筆者藉由文獻資料、考古報告、信仰心理來推測為何以「雞」為首，盛行於六朝的雞首壺，形成之因素及相關歷史背景，形塑其可能性與演變性。筆者整理學者的文章內容，製成表格：（表 2-2）

表 2-2：雞在中國文化的意涵與典故

<p>一、 太陽鳥</p>	<p>「雞」在中國江南民間是太陽神的化身，太陽則是知時並在天空中翱翔的金雞。稻作區先民在追蹤鳥（日）崇信的化身附物時，曾將炙熱的敬仰，投射於雞（雉）、鷹、燕、烏等玄黑色的鳥類及虛幻的鳳等。¹³⁰</p> <p>在我國古代神話中，太陽神和鳥是合為一體的，《山海經·大荒東經》：「一日方至一日出，皆載於鳥。」¹³¹</p> <p>大和村彩陶上的陽鳥紋飾或許是崇拜太陽和鳥為圖騰的部族在藝術形象上的反映。殷氏族的始祖以玄鳥作為圖騰，在連雲港將軍岩岩畫中就有歌頌祖先玄鳥的圖騰。¹³²</p>
<p>二、 掛金雞</p>	<p>金雞啼叫太陽才出來，畚族人民稱為神雞和報曉吉祥雞，把雄雞畫成圖像，祭祖時掛在大門的左側。雞是落地的太陽變成，</p>

¹²⁸ 弗雷澤著，汪培基譯（1991），金枝，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頁 21-23。

¹²⁹ 弗雷澤著，汪培基譯（1991），金枝，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頁 665-667。

¹³⁰ 陳勤建（2006），民俗文化趣談生肖，香港：萬里書店，頁 130-2。

¹³¹ 郭璞著，清郝懿行箋，大荒東經，山海經箋疏，第十四卷，頁 5、6。

¹³² 黃明廷、許智范（1996），中國古代的圖騰崇拜，南方文物，第 2 期，頁 73。

	尊稱為金雞，是先民信奉太陽鳥再現實。而門神左神荼右鬱壘，是雞關照下的兩名大將，以鎮不祥之鬼。 ¹³³
三、雞卜	「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迺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始用。」 ¹³⁴
四、雞形盤古	在浙江民間，雞在世俗中成為極重要的神靈。神話傳說中開闢天地的大神，「盤古長著雞的頭，人的身，整個身架便像」雞更為帝俊、帝堯的化身。 ¹³⁵
五、雞有五德	《韓詩外傳》為雞有五德說的來源，五德是指雞的文武勇仁信。「田饒謂哀公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拒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信也，信也。雞有五德說。』」 ¹³⁶ 雞的五德，是由人揣摩歸納出來的，體現了人們的道德理想。誇讚雞有五德，其實是言人該有此五種德行。古代讚美雞的詩文很多，往往也是借雞詠懷。 ¹³⁷
六、雞媒	《雞媒與鹿迪》一文中記錄在四川涼山彝族聚居地區，獵人以雞媒誘獵野雞。 ¹³⁸

¹³³ 陳勤建（2006），民俗文化趣談生肖，香港：萬里書店，頁 132-134。

¹³⁴ 班固，郊祀志第五下，漢書二十五卷，頁 286。

¹³⁵ 陳勤建（2006），民俗文化趣談生肖，香港：萬里書店，頁 135-139。

¹³⁶ 見韓嬰撰韓詩外傳（1989），卷二，叢書集成續編，第 110 冊，199 頁。台北：新文豐出版，
臺一版。莊伯和（1992），幽幽潛五德—從歷代的繪畫中看中國人理想中的雞的形象，雞—
生肖、藝術、命運，萬象圖書，頁 74。

¹³⁷ 陳勤建（2006），民俗文化趣談生肖，香港：萬里書店，頁 145。

¹³⁸ 陳勤建（2006），民俗文化趣談生肖，頁 141-143。

七、 禦死辟惡	今人卒得鬼刺痲病，殺雄雞以博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¹³⁹
八、 雞寶之說	<p>道家云：「昔仙人桐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碎為藥，服之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據說，石雞在地下鳴啼報晨，就地挖掘，獲得石雞。每逢太平盛世，石雞上下翻飛，被人們視此為祥瑞。¹⁴⁰</p> <p>「陳寶，又臣瓚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正義曰括地志云寶雞神在歧州，陳倉縣東二十里，故陳倉城中。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尋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媚，常在地中食不知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媚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雉雌，上陳倉北坂為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皆如其言也。」¹⁴¹</p>
九、 金雞崇信	實際上，從人類學的視角，無論是史料還是口傳的歷史和考古資料分析，中國的金雞崇信，遠比現有的文字記載要早。它是中國江南吳越地區先民稻作鳥（日）複合崇信象徵符號—太陽鳥發展軌跡上的一個物象展現。 ¹⁴²
十、 吉祥	兩晉至南朝所出現的雞冠高聳的雞頭罐、雞首壺就是一種趨吉的標誌。古人認為，公雞有報曉和報喜之能，司晨報曉、驅除

¹³⁹ 應劭，風俗通義，卷八，欽定四庫全書，826冊，頁400。

¹⁴⁰ 陳勤建（2006），民俗文化趣談生肖，頁164。

¹⁴¹ 司馬遷，史記秦紀五，百衲本二十四史，台灣：商務印書館，頁62。

¹⁴² 陳勤建（2006），民俗文化趣談生肖，香港：萬里書店，頁172。

	<p>黑暗，意味著前程象朝陽一樣光明燦爛。雞又含有吉（雞的諧音）祥如意的象徵意義。¹⁴³而雞在民間受到歡迎，則多是因為雞與「吉」字同聲之故，大雞即大吉。¹⁴⁴</p>
十一、鬪雞、鏤雞子、鬪雞子	<p>《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鉅。平子怒，益宮於郈氏，故郈昭伯亦怨平子。」¹⁴⁵南朝的娛樂活動鬥雞，鬥雞之風由來甚早，《左傳》中記有季氏、郈氏二家鬥雞。這項娛樂梁陳時期依舊盛行，並且留下許多鬥雞詩。¹⁴⁶</p> <p>此外按《玉燭寶典》曰，此節城市尤多鬪雞之戲，左傳有季郈鬪雞，其來遠矣。古之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染藍茜雜色，仍加雕鏤遞相餉遺或置盤俎。管子曰，雕卵然食之，所以發積藏散萬物，張衡南都賦曰，春卵、夏筍、秋韭、冬菁，便是補益滋味，其鬪卵則莫知所出，董仲舒云，心如宿卵，卵爲體內藏，以據其剛，彷彿鬪理也。¹⁴⁷</p>
十二、雄雞	<p>《山海經》「雄雞瘞之，糴用稌。」¹⁴⁸和「肥牲祠之用一黑犬子，於上用一雌雞。」¹⁴⁹故祭祀時雄雞成爲必要的祭品。此外雄雞在</p>
十三、雞人	<p>古代宮廷中依雞鳴而報時的人，稱爲雞人。</p> <p>《周禮》：「雞人，夜乎旦，以叫百官。」象其知時也。</p>

¹⁴³ 施祖青（2000），越窯瓷器中的宗教與美學，東方博物第五輯，第6期，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頁190。

¹⁴⁴ 王軼凌供稿、浙江省博物館編（2005），東方博物第十四輯，第3期，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封底。

¹⁴⁵ 楊伯峻編著（1993），春秋左傳注下冊，台北：洪葉文化，頁1461-1462。

¹⁴⁶ 李天石（2005），南朝文化（下），南京：南京出版社，頁127。按：鬥雞是六朝人娛樂，見張承宗著（2004），六朝民俗，南京：南京出版社，363頁。

¹⁴⁷ （梁）宗懔，荆楚歲時記，欽定四庫全書，589冊，頁20。

¹⁴⁸ 山海經，中山經，欽定四庫全書，卷五，1042冊，頁38。

¹⁴⁹ 山海經，中山經，頁39。

十四、 雞日	<p>董勛同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馬、六日爲爲人，未之聞也，似億語耳經傳。¹⁵⁰此外有「一日雞，天清氣朗，人安國泰，四夷遠貢，天下豐熟。」的說法。¹⁵¹</p>
十五、 雙頭雞	<p>漢武帝「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具鳴，武帝置於甘泉。」¹⁵²就目前出土的考古報告，也出現雙頭雞的雞首壺。¹⁵³</p>

¹⁵⁰ 杜公瞻，玉燭寶典，叢書集成新編四十三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卷一，頁 326。

¹⁵¹ 歲時廣記，欽定四庫全書，卷九，43 冊，頁 400。

¹⁵² 王嘉，拾遺記，欽定四庫全書，1042 冊，頁 336。

¹⁵³ 筆者於 2008 年 5 月 11 日（日）下午 2：30—3：30，前往台北典藏創意空間（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121 巷 9-1 號地下一樓），聆聽浙江省博物館研究員王屹峰，演講主題「孤山雜記：自漢代以來浙江古代陶瓷器的幾個新資料」，他說浙江有三頭雞的雞首壺，但就筆者目前收集的資料，只見其雙頭雞首壺，也從電子郵件上詢問相關三頭雞首壺資料，王屹峰研究員可能忙碌，故至今尚未有進一步的相關答覆，爲有待研究之處。